

《智环启蒙》的“出口转内销”

胡译之

1856年,英国传教士、汉学家理雅各(James Legge, 1815—1897),为他所执教的香港英华书院编译出版了一部名为《智环启蒙塾课初步》(以下简称《智环启蒙》)的中英双语教科书。该书根据英国人查尔斯·贝克(Charles Baker, 1803—1874)的 *Graduated Reading: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* 为底本改写而成,内容涵盖天文地理、政治经济,俨然一部小“百科全书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书中介绍了当时在西方风行的一种学说——“文明等级论”。所谓文明等级论,就是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,按照“文明程度”之高下,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发展模式。

在《智环启蒙》一书中,理雅各把世界各国分成了四个等级,分别命名为“国之野劣者”(Savage Nations)、“国之野游者”(Barbarous Nations)、“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”(Half-civilized Nations)和“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”(Civilized Nations)。其中的“civilized”,也就是后来我们习见的“文明”或“开化”。其中涉及当时中国的中文段落如下:

第一百五十六课 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论(Half-civilized Nations)

有等邦国之民,于格物致知,已有所获,于教化政治,已有所行,但仅得其偏而未得其全者。如阿非利加数国,亚西亚之印度、日本、波斯、土耳其等国皆然。如此之邦,其人耕田,颇识工艺,有法有书,惟于有用之艺,多所未达,而习俗亦有惨酷者。

乍看之下,引文似乎并未提及中国。但稍一比较《智环启蒙》的英文文本与贝克的原著,便会发现,贝克原著将中国列入了“Half-civilized Nations”;理雅各编写时,虽然将中国从列举的名单中删除,但加上了“and other countries of Asia”字样,相应的中文文本为“亚西亚……等国皆然”,可见理氏本意,是把中国计入“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”内了。文字增删之举,大约是理氏恐触发中国人怨谤,对原著进行的“技术处理”。而欧洲多数国家和美国,则处在文明四等级顶端的“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”之列。

我们不免好奇,当时的人

们看到这一论断时会作何感想?毕竟,彼时国人尚把“华夷之辨”看作天经地义。可惜的是,目前我们对于《智环启蒙》在中国香港以外地区的使用情况缺乏更多文献印证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这本书在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中,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。一方面可能由于教科书多用于学堂授课,读者类型比较单一;另一方面,或许理雅各对于“半文明国”名单的模糊处理奏了效,这部书最终并没有触碰到国人的神经。

不过,接下来的例子便可以证明,“文明等级”的言论在当时可能引发多大的风波——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出使期间,曾将自己在异邦所见所感巨细靡遗地记入日记,呈交总理衙门审阅,后刊成《使西纪程》一书。他在1878年3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:

西洋言政治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(civilized),欧洲诸国皆名之。其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,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(half-civilized)。哈甫者,译言得半也;意谓一半有教化,一半无之。其名阿非利加诸回曰巴伯比里安(barbarian),犹中国夷狄之称也,西洋谓之无教化。三代以前,独中国有教化

耳,故有要服、荒服之名,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。自汉以来,中国教化日益微灭;而政教风俗,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。其视中国,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。

从郭嵩焘的字里行间,可见他颇受到刺激。在后文中,他提出“泰西政教风俗美善”,并建议清人向西方学习,竟“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”。最后为平息物议,朝廷诏令其书“奉旨毁板”,其人则不复起用。

1860年代,《智环启蒙》漂洋过海来到日本。据沈国威先生研究,1860年,包括20册《智环启蒙》在内的大量外国书籍通过荷兰传教士由中国运往日本;考虑到中日之间江户以来的图书货物流通情况,很可能在此之前,《智环启蒙》就已被介绍到日本了。大概就在这个时候,《智环启蒙》进入了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视线。

1859年,福泽谕吉放弃兰学,开始学习英语。在由兰学转向英学的过程中,中国的汉译西书和英华辞典,常常是日本知识阶层主要的知识来源,福泽谕吉和很多日本启蒙思想家都曾通过《智环启蒙》学习英语。在福泽的手泽本《智环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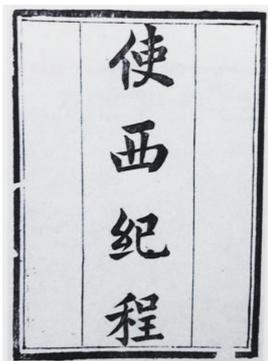
蒙》的“后跋”页末,显示该书为1856年的初版。虽然后来福泽谕吉作为幕府使节团随员赴欧美时,也曾利用官府发放的旅费购置大量英文书籍和英文中学教科书,且学界一般认为这些书籍构成了福泽“文明论”叙述的基础;但他初次接触《智环启蒙》“文明论”的时间,很可能要早于这些英文教科书和相关英文书籍。

福泽选择接受并宣传《智环启蒙》中“文明论”以及日本被列入“半开化国”的篇章,发愿要让日本进化为“文明国”。在1875年出版的《文明论概略》中,他指出:

若论现今世界的文明,欧洲诸国及美国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,土耳其、支那、日本等亚洲诸国,可称为半开化的国家,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蛮国家。

现今世界各国,无论它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开化状态,若要谋得本国文明的进步,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,确定其为评论的标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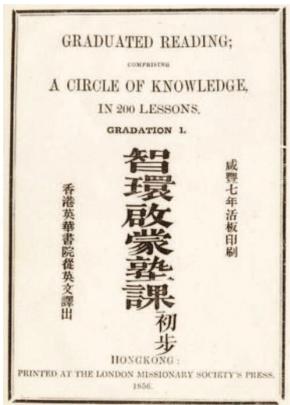
福泽以《文明论概略》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,不但发挥了开启民智和推动日本文明开化的作用,更影响了一批近代中国思想家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,有志之士无不寻求救国良策,



▲郭嵩焘与《使西纪程》



▲福泽谕吉



▲《智环启蒙》扉页与“半文明、文明国”内页

渐有国人宣扬“文明论”。此时,距《智环启蒙》在香港首次出版已过去近40年。

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积极使用“文明”一词且产生较大影响者。他发表于1899年8月23日《清议报》上的《文野三界之别》,就直接源自福泽谕吉的《文明论概略》。在同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,他断言:

今所称识时务之俊杰,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国也,欲进吾国,使与泰西各国相等,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,使与泰西文明相等。此言诚当矣。

后来,这一理论逐渐为国人所认同。到清末民初,朝野上下几成“言必称文明”之势。以20世纪初《申报》刊载广告为例。所售者从书籍到医药,各种“文明书局”、“文明学社”,乃至“文明戒烟丸”之类,不一而足;来自国外的日用器物、婚丧礼仪、饮食消费及休闲娱乐也统统被贴上“文明”标签。甚至孙中山在其《大总统宣言书》中,也对新成立的民国跻身“文明国”抱有期待。这些现象,都可以为“文明论”流行的时代底色作一注脚。

然而,救亡心切的国人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,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“文明论”,以至于忽视了对这一概念的反思。“文明论”并非一个普通的中性概念,它的出发点是建立起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,获得对文明低位阶国家干预和改造的合理性。西方人在著作中,尤其是以《智环启蒙》为代表的教科书中宣传“文明等级论”,其实是19世纪英美诸国的一种普遍策略,目的在于使该理论成为“带有普世性的知识与价值观念”。由此衍生的一个问题是,文明等级划分标准是否具有科学性?说到底,它缺乏科学的归纳方法,是一种“以论带史”式的学说。

《智环启蒙》是理雅各为中国学生而作,但是,这本书在中国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,反而在邻邦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并影响了福泽谕吉文明论的书写;最终,文明论又经由中国思想家的接引,被清末民初的国人不加甄别地内化为一种心理常识。这种近代史上奇特的“出口转内销”现象,值得我们深思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)